

文史知识

10

WENSHI ZHISHI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赵朴初

佛教与儒教

任继愈

我和佛教研究

季羨林

诗与禅

袁行霈

慧远及其因果报应说

周齐

怎样认识佛教徒的人生观和道德观

文丁

1986





医药学院610 2 01478456

文史知识

1986年第10期

(总第64期)

佛教与中国文化专号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赵朴初	3
佛教与儒教	任继愈	9
• 治学之道 • 我和佛教研究	季羨林	13
• 文学史百题 • 诗与禅	袁行霈	18
历史 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发展	杨曾文	24
百题 略论中国佛教的特质	方立天	31
佛教和中国古代哲学	杜继文	38
佛 何谓“四大皆空”	圣 辉	42
教 佛与佛教徒	常 正	43
常 中国僧侣与劳动生产	宽 忍	46
识 孟兰盆会是怎么回事	角 里	49
佛教节日知多少	角 里	50
“神圣”的花木(佛籍中花木漫谈)	亦 丽	51
佛教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的音乐活动	阴法鲁	56
艺术 漫谈塔的来源及演变	罗哲文 黄 彬	61
佛教对中国神魔小说之影响二题	白化文	66

诗	谈谈以禅喻诗	周振甫	71
文	因花悟道 物我两忘——王维《辛夷坞》诗赏析	陈仲奇	75
欣	虚幻的佛国与真实的人生		
赏	——王梵志诗《世间日月明》浅析	张锡厚	78
	浅说《百喻经》中的寓言故事	丁 侠	82

唐宋之际“三教合一”的思潮	王志远	86
---------------	-----	----

佛	佛教在印度的产生及其基本特点	马鹏云	89
教	中国佛教的宗派	思 源	94
源	藏传佛教密宗	李冀诚	96
流	日本佛教略述	张大柘	101

• 文史书目答问 •

研究中国佛教史的重要资料——三朝《高僧传》	毛双民	105
-----------------------	-----	-----

人	三次舍身寺院的梁武帝	方 安	109
物	慧远及其因果报应说	周 齐	114
春	六祖慧能与禅宗	许抗生	119
秋			

• 文史信箱 •

怎样认识佛教徒的人生观和道德观	文 丁	124
-----------------	-----	-----

• 文史信息 • 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国际理事会议在京召开(12)

关于如何认识宗教的本质及社会作用(93)

后 记	编辑部	128
-----	-----	-----

补白3则	大乘和小乘(30)	三藏(85)	禅、定、慧(108)
------	-----------	--------	------------

玄奘取经图(封二)	佛塔(封三)
-----------	--------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赵朴初

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文化问题，是最近思想文化界讨论的“热门”论题。传统文化的讨论，又是这“热门”之中的兴奋点。对于这次讨论，我了解不够，考虑也不太成熟。但我认为，人类文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断。我们要汲取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精华来充实、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我看中国传统文化也应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现在有一种偏见，一提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其实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自从东汉初年佛教传入，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岁月，它已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举个例子来说，语言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因素吧，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许多用语来源于佛教。比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词汇都是来自佛教的语汇。有一次我和夏衍同志讲起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的俗语当中来自佛教的相当多，比如“一针见血”就是嘛。可见，如果我们要完全撇开佛教文化的话，恐怕连话也说不周全了。所以，我在许多场合都呼吁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现在《文史知识》办“佛教与中国文化”专号，非常好，我非常拥护。只是我对这一专题缺少系统的研究，只能把自己的一些感想讲出来，供大家参考。

要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佛教。现在一讲佛教，有的人会说，不就是烧香磕头、求神拜佛吗？把佛教看得过于简单化。我看毛病就出在只看到较低层次的佛教表面现象的一个侧

面，对整个佛教缺乏全面的了解。现在社会上对佛教有这样片面的看法，我想是与我们佛教徒本身的缺点有一定关系的。中国佛教由于长期衰落，就其本身来说，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局限。我们佛教界要克服历史遗留下来的局限和缺点，为今天建设两个文明服务。

到底什么是佛教？广义地说，它是一种宗教，包括它的经典、教法、仪式、制度、习惯、教团组织等等；狭义地说，它就是佛所说的言教。如果用佛教固有的术语来说，应当叫做“佛法”。佛法的基本内容可以用“四圣谛”来概括（谛的意思是真理）：苦谛，指经验世界的现实；因谛（或集谛），指产生痛苦的原因；灭谛，指痛苦的消灭；道谛，指灭苦的方法。佛经所说的道理非常多，其实都是围绕四圣谛而展开讨论的。四圣谛所依据的根本原理则是缘起论。佛教的所有教义都是从缘起论这个源泉流出来的。所谓“缘起”，就是指一切事物或一切现象的生起，都是由相待（相对）的互存关系和条件决定的；离开关系和条件，就不能生起任何一个事物和现象。因、缘一般地解释，就是关系和条件。在佛陀时代的各教派中，缘起论是佛教所特有的。佛经中说缘起有十一个意义：1. 无作者义，2. 有因生义，3. 离有情义，4. 依他起义，5. 无动作义，6. 性无常义，7. 刹那灭义，8. 因果相续无间断义，9. 种种因果品类别义，10. 因果更立相符顺义，11. 因果决定无杂乱义。我们归纳一下，这十一义大约有四个重要论点：一、无造物主；二、无我；三、无常；四、因果相续。所谓无造物主，就是否定有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认为任何一个因都是因生的，任何一个缘都是缘起的，因又有因，缘又有缘，从竖的方面推，无始无终；从横的方面看，无边无际。佛教不承认有人格化的造物主，也否认宇宙本原的人格化的存在。所谓无我，就是认为世界一切事物皆无独立的实在自体。所谓无常，就是说一切事物都受到时空条件的制约而变动不居。所谓因果相续，就是说因缘所生的一切法（事物或现象）固然是生灭无常的，而又是相续不断的，如流水一般，前前逝去，后后生起，因因果果，没有间断，这是从竖的方面而言；从横的方面来说，因果关系固然错综复杂，但其间又法则井然，一丝不乱，一类的因，产生一类的果，如善因得善果，因与果相符，果与因相顺。总起来

看，四个论点实际上只是两个论点——无常和无我。“无常”就是生灭相续，它包括了“因果相续”的意义。“无我”就是没有主宰，既没有一身之主宰，也没有宇宙万有之主宰。“无造物主”之义也就包括其中了。这就是佛教对宇宙万有的总的解释。

佛是人，而不是神。他是公元前六世纪时的人，有名有姓，他的名字是悉达多，姓乔达摩。因为他属于释迦（Śākya）族，人们又称他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佛”是“佛陀”的简称，是 Buddha 的音译，意为“觉者”或“智者”。当然，到了后来佛陀被人们神化了，但是根据佛教教义，佛不是造物主，他虽有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却不能主宰人的吉凶祸福。佛教还认为过去有人成佛，未来也会有人成佛，一切人都有觉悟的可能性，所以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得成佛”。

佛教哲学本身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称誉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在世界观上，佛教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事物是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网络之中。因此，在西方学术界中有人认为佛教是唯一的“无神论”的宗教。这种看法，好象不易理解，但佛教教义确实如此。这个道理很简单，佛教既以“诸法皆空”（即俗语中的“万法皆空”）为教义，当然神也是空的。神既然空，何来创造世界之事。但是，佛教又认为“业果不空”，“业”即人的有意识的行为活动，这种活动必然要产生一定的结果，这二者都是实际存在的，不能说是空无所有。不过，它们也都属于缘起、无常的范畴，没有独立存在固定不变的体性，所以也是一种无自性的性空。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交互影响，推动了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它以独特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给予人们以新的启发，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一个新的世界。

佛教对中国文化有十分深刻和广泛的影响。佛教传来中国近两千年，思想体系发展演变成十多个派别，可谓是学术成果灿烂辉煌，对中国思想文化起了重大的影响和作用。在文学方面，从对我国文学发

展的影响来看：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其中一部分本身就是典雅、瑰丽的文学作品。如《维摩诘经》、《法华经》、《楞严经》特别为历代文人所喜爱，被人们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研读。鲁迅先生曾捐款给金陵刻经处，刻印了一部《百喻经》。这部经所叙的譬喻故事，今天常常被译为语体文，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佛教还为中国的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法华经》、《维摩诘经》、《百喻经》等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的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大文学家的诗歌创作。再从佛教对我国文体变化所起的作用来看：我们从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各种变文可以看出后来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俗文学的渊源所自。此外，还有由禅师们的谈话和开示的记录而产生的朴素、活泼、自由的语录体，后来也被宋明理学家仿效而产生了各种语录。在音韵学方面，如过去中国字典上通行的反切，就是受梵文拼音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在艺术方面，首先要说明一个普遍存在的误解。外国人由于传统的成见，看到佛教庙宇中有许多佛菩萨的造像就认为佛教是“多神教”或偶像崇拜，我们也有人这样看。其实，佛教在最初的小乘流行时期（约五百余年）并没有佛像，一般用佛的脚印图或菩提树做标记，大乘佛教流行后才开始雕刻塑造佛像，一是为了纪念，二是表示佛教的教义，这和偶像崇拜不是一回事。如最早的佛像大多是佛在菩提树下成道说法，或者是佛在双树下涅槃，前者表示佛由人修而成，后者表示生必有灭的无常教义。其后称这种使教义形象化的方法为“表法”，导致佛教在艺术方面的创造和发展，产生极为灿烂的成果。例如，大家知道中国的建塔造像，起源于佛教。建塔造像包括两门艺术，一是建筑，二是雕塑。随着佛教的传播，建塔造像的艺术亦随之风行全国各地。四世纪到六世纪，全国各地到处涌现壮丽的塔寺建筑。晚唐诗人杜牧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可知当时的寺院之多。现在我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我国各地风景轮廓线的标志。世界闻名的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是我国雕塑艺术的宝库。此外，佛画艺术也很著名。佛画主要是壁画。最初盛行的是佛陀本生故事画，发展到唐代，逐渐为经变故

事画所代替。所谓“经变画”也就是将佛经中的故事譬喻演绘成图。经变画的兴起使佛画内容大大丰富起来，也就能使画家们发挥更大的想象力和给了他们驰骋艺术才能的更广阔的天地，所以唐代佛寺壁画极盛。当时名画家辈出，如阎立本、吴道子皆以擅画佛画而知名于世。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般若和禅宗的思想很有关系。由此可见佛教对当时绘画艺术的影响之大。另外，佛教版画也随着佛经的刊印很早就产生了，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中国最早的版画便是佛经上的释迦说法图。

伴随佛教俱来的还有天文、音乐、医药等的传习。1955年我国发行邮票纪念古代天文学家一行，就是八世纪的一位高僧。他制定了《大衍历》，测定了子午线，对天文学有着卓越的贡献。至于医药，隋唐史书上记载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方就有十余种，藏语系佛教《大藏经》中还有医方明之学，存有大量医学著作。音乐方面，公元三世纪，中国已有梵呗的流行。中国唐代的音乐中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康国乐、骠国乐、林邑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

佛教各宗派学说，对中国思想界也起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有的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人感到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的哲学史基本上是佛学在中国的发展史。至于宋明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华严宗、禅宗理论的刺激和影响而产生的。在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研究佛学成为一时的风气。一些民主思想启蒙者，如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都采取了佛教中一部分教理作为他们的思想武器，甚至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家瞿秋白同志的早年时期，也受过佛教思想的影响。他曾说过：“无常的社会观，菩萨行的人生观引导我走上了革命道路。”什么叫“菩萨行”呢？凡是抱着广大志愿，要将自己和一切众生从苦恼中救度出来，要使大众得到利益，并使大众觉悟，凡是有这种志愿的人都可称为“菩萨”。为实现这种志愿而坚持实践就称“菩萨行”。可见佛教的慈悲、平等、无常、无我的思想在近代的知识界中是起了一定的启发和鼓舞作用的。

佛教文化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如此之大，要搞中国古代文

史哲艺术等的研究，不搞清楚它们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及所受的影响，就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也不可能总结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规律。比如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文化史，就不能不研究佛教。事实上，自公元148年安世高来华译经算起，至公元1175年朱熹、陆九渊鹅湖之会（前者标志一个新的文化运动——佛学之开始，后者标志又一个新的文化运动——理学之创立），这一千余年是中国民族文化的辉煌时期，也就是中外学者盛称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化。恰恰在这一时期中，作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主流的却是佛学。其时间之长，声势之大，影响之广，都远非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所能比拟。所以胡适当年写《中国哲学史》半途辍笔，就是因为当时他不懂佛学，写不下去了。再举个例子，周老（建人）曾特地给我写了两封信，要我们赶紧研究佛教。后来我去看他，他和我讲，他曾和我国一个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住邻居，朝夕过从。这位史学家早年曾对佛教采取过完全否定的态度，晚年开始系统地研究佛经，并作了大量的笔记，并说自己在补课。他曾对周老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能全面弄懂中国文化。这件事，我感慨很深。我们应该把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一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谈到佛教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我在前面曾经讲过人类文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断。我们要汲取传统文化中的一切有价值的精华来充实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社会主义时期的佛教，应该如何结合时代发展的趋向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呢？重要的是要吸取佛教文化的精华，要发扬“人间佛教”的精神。“人间佛教”的主要内容是五戒、十善和六度、四摄，前者着重在净自己的身心，后者着重在利益社会人群。从历史上看，佛教徒从事的公益事业是多方面的，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有的僧人行医施药，有的造桥修路，有的掘义井、设义学，有的植树造林，这在古人记载中是屡见不鲜的。特别是植树造林，成就卓越。试看我国各地，凡有佛教寺塔之处，无不绿树成荫，景色宜人，装点了祖国的万里江山。我们要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继承先人的遗业，以“人间佛教”入世度生的精神，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

佛教与儒教

任继愈

研读中国哲学史的人，都会发现宋、元、明理学家们，如周、程、张、朱、陆、王诸大家，在青少年时期都有“出入于佛老”的治学经历。已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中，不少的书也曾提到过，如朱熹的“理一分殊”的概念，“月印万川”的比喻，来自佛教，有的指出来自佛教的华严宗。陆象山指斥朱学近“道”（道教），朱指斥陆学近禅（佛教）。王夫之也指出朱熹的学术来自佛教。王夫之自己以儒学正宗自居。王守仁也自称得自孔孟真传。这些相互攻击和自我标榜，都表明理学家们对于佛教、道教持反对立场。

如果仔细考察，会发现宋、明诸儒并没有真正反对佛教，倒是可以认为他们是佛教的直接继承人。也可以说，他们是接着佛教的一些中心问题，沿着他们的路线继续前进的。

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中华民族在认识世界的道路上不断把哲学发展推向前进。试作粗线条地回顾，我们可以说，先秦哲学的世界观偏重在宇宙的构成论。好比人类幼年时期，对一事物不了解，出于好奇，总要问一个是什么做的？有的哲学家回答是水，是火，是地、水、火、风，精气，元气。古希腊的哲学是这样，中国哲

总之，存在了将近两千年的中国佛教，拥有内容丰富绚丽多采的文化遗产，它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对于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在社会主义民族文化建设中的作用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和总结，作出正确的估价，我们就会发现，佛教文化的精华同样可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养料。

赵朴初先生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本文系根据谈话记录整理而成。

学史也差不多是这样走过来的。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视野又有所扩大。秦汉哲学构筑了宇宙构成的总模式。以阴阳五行说填充了人类世界，把天地构成、人物化生、社会结构、政治治乱、人性善恶，都力图纳入一个总模式中，用五行模式统摄世界，五方、五行、五味、五德、五色、五情、五声，都给安排在一定的地位。中国哲学史进入了完整的宇宙论阶段。

人类认识不能停留在宇宙论的阶段，于是进而发展为“本体论”的阶段。魏晋之际，产生了玄学。玄学的中心议题是探讨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提出了本末、有无等重要范畴。玄学的出现，标志着人们的认识又向前发展了。不但要求认识事物大、小、方、圆，而且要求追问大、小、方、圆之“所以然”。这个“所以然”的提出，比秦汉时期的宇宙论阶段，显然又深入了一层。

认识的过程，总是从外到内，从物到己。先认识世界外界，然后反观自己。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也恰好证明了这个道理。由考察宇宙万物的本体，进而探索人类自身的“本性”（人的本体）。

这也是从认识自然，进而认识社会、认识历史、认识人性的必然过程。关于人性善恶的探讨，先秦、秦汉都有不少流派谈到了。但他们停留在表面观察、简单地分类（如人性是善、是恶、是有善有不善、无所谓善不善，后来又有“善恶混”、“性有三品”等），还没有进一步探究，善、恶有没有起源，善、恶之间能否转化，如果能转化，是靠外因还是内因？善恶有没有生理的基础和心理基础？这些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有过相当充分的讨论，并且成了南北朝时期的“佛性论”的中心议题。当时关于成佛问题，实质上是为善、去恶，成圣、成佛对每一个人是否有同等的资格，有同等的机会？南北朝时期的“佛性论”，就是“人性论”、“心性论”。

由南北朝到隋唐，佛教创立了许多宗派。影响较大的有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等。三论宗、唯识宗为时甚暂，影响不远。这些宗派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也是引起社会上重视的问题，是佛性问题，即心性论。

隋唐佛教讨论的心性问题，涉及的范围既深且广，它涉及人类心

理活动、感觉经验、道德观、认识论、社会观、本体论的综合心理训练，宗教实践（修养方法）。所谓“明心见性”、“即心即佛”、“性体圆融”、“无情有性”，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建立的各宗的心性论，并在各自建立的心性论的基础上构造各自的神学体系。这是各宗各派的学说共同的思潮和趋势。各个宗派之间有很大的分歧，有的接近中国传统的性善说，有的接近于性恶说，也有游移于两者之间的。心性论曾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恶”的来源的解释上。止恶，向善，遏制欲望，发明本心，也是众多佛教宗派共同探讨的热门问题。

抓住了这个大的潮流和总的趋势，我们再看宋明理学所关心的许多问题，以至他们所提出的重要范畴，就不难发现他们接过佛教在隋唐三百年来反复讨论的心性论，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宗教哲学。社会上叫做理学，元朝人称为道学，西方学术界称为新儒学，以区别于孔孟的儒学，我称它为儒教，讲的都是同一回事。“存天理，灭人欲”，朱熹说“人之有生，性与气合而已。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则性主于理而无形，气主于形而有质”。宋儒区别“人心”与“道心”并建立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学说。宋儒自认为“有补于后学，有功于圣门”。如果查一查隋唐诸宗派的心性论，这些议论似曾相识，并不生疏，俯拾即是。至于“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理一分殊”的说法，那是明显的来自佛教，证据确凿，就不必多说了。

佛教与儒教有着直接继承的关系，特别在心性论这个问题上，儒教是接着佛教讲的。正因为佛教、儒教有这种内在的继承关系，所以佛教经过儒教加工改造后，好象被打败了，衰落了。实际上，佛教的宗教修养方法，特别是心性之学的修养方法在儒教中合法化，成了主静、主敬，禅定成了静坐，“克己复礼”成了“存天理、灭人欲”。《尚书·大禹谟》的十六字真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宋儒按照佛教的宗教修养的标准，进行注解，完全变成了儒教修心养性的咒语。

不应停留在字句上找儒与佛的异同，要从他们共同关心的思想方法、修养目的、修养方式，以及他们研究的问题上着眼，更容易看到

宋以后，三教合一的思潮已深入学术界的各个领域。三教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最后成为一个三教合一的整体。儒教以自己为主，吸收了佛教及道教。佛教、道教也走上三教合一的道路，向儒教的纲常名教靠拢，共同为封建宗法制度服务。

唐宋以后的哲学家中，不但唯心主义者继承了佛教，唯物主义者如柳宗元、刘禹锡、王夫之、戴东原也都是佛教心性论的继承者，只是他们的讲法有所不同。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已被世界所公认；儒教是不是宗教，国内外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说儒教是宗教的，又有两种理解：一派以孔子为儒教的创始人，孔子是教主；一派认为宋明理学为儒教，孔、孟创立的是儒家，先秦儒家是学派，不是宗教。对后世以至当前的社会生活仍在起作用的，并不是先秦的儒家，而是宋明以来的儒教。对孔子的研究已引起全国的关注，恢复孔子的本来面目，并不难。对儒教（或称为宋明理学）的研究似乎还未引起重视，而且难度也较大，有些准备工作要做，现在条件还不大具备。困难是困难，它却直接关系到我们现代化的命运。远的且不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说与孔子无关，却不能说与儒教无关。这不是篇把文章能说得清楚的。儒教的兴衰功过，我们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宋以后几卷，将有充分论述，这里不能深论。

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国际理事会议在京召开

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国际理事会于六月二十五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会期六天。来自三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二十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世界和”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多边宗教和平组织。这次理事会的主题是，通过工作和祈祷争取世界和平。会议讨论了宗教对和平、正义与教育的贡献等问题。会议通过了《致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各地区、国家和地方分会书》。

会议期间，中国五大宗教（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道教）分别举行了宗教仪式，为世界和平祈祷。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和赵朴初在广济寺参加了首都佛教界祈祷世界和平的法会。

我和佛教研究

季 羨 林



季羨林，1911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为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曾兼任系主任，副校长等职。著有《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及论文多篇。

我接触到佛教研究，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1935年，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算是我研究佛教的滥觞。从那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的年代里，不管我的研究对象“杂”到什么程度，我对佛教研究始终锲而不舍，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始终没有降低。

“你研究佛教是不是想当和尚呀？”有人曾半开玩笑地问我。我从来没有信过任何宗教，对佛教也不例外。而且我还有一条经验：对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只要认真地用科学方法加以探讨，则会发现它的教义与仪规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都有其产生根源，都是人制造成的，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有的简直是非常可笑的。因此，研究越深入，则信仰越淡薄。如果一个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种宗教，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他的研究不实事求是，不够深入，自欺欺人。佛教当然也是如此。

那么为什么还要研究佛教呢？要想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应该先解决对佛教评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评价是众所周知的，从本质上来看，也是正确的。（参阅赵复三《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三期《究竟怎样认识宗教的本质》）佛教这个宗教当然也包括在里面。但是我感觉到，我们过去对佛教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的评价多少有点

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个别著名的史学家几乎是用谩骂的口吻来谈论佛教。这不是一个好的学风。谩骂不等于战斗，也不等于革命性强，这个真理早为大家所承认，可惜并不为这位史学家所接受。平心而论，佛教既然是一个宗教，宗教的消极方面必然会有。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但是佛教在中国产生的仅仅是消极的影响吗？这就需要我们平心静气仔细分析。从整个世界自古至今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一个文化，不管在某一时期内发展得多么辉煌灿烂，但是如果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又没有外来的新成分注入，结果必然会销声匿迹，成为夏天夜空中的流星。打一个未必很恰当的比方，一种植物，必须随时嫁接，方能永葆青春，放任不管，时间一久，就会退化。中华民族创造了极其卓越的文化，至今仍然没有失去活力，历时之久，为世界各国民族所仅见。原因当然是很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认为，就是随时吸收外来的新成分，随时“拿来”，决不僵化。佛教作为一个外来的宗教，传入中国以后，抛开消极的方面不讲，积极的方面是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的。它几乎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给它增添了新的活力，促其发展，助其成长。这是公认的事实，用不着再细加阐述。

我们过去在评价佛教方面，不是没有问题的。一些史学家、哲学史家等等，除了谩骂者以外，评价也往往失之偏颇，不够全面。他们说，佛教是唯心主义，同唯心主义作斗争的过程，就是中国唯物主义发展的过程。用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佛教只是一个“反面教员”。我们过去习惯于这一套貌似辩证的说法，今天我们谁也不再满足于这样的认识了。我们必须对佛教重新估价。一百年以前，恩格斯已经指出来过，佛教有辩证思想。我们过去有一些论者，言必称马恩，其实往往是仅取所需的狭隘的实用主义。任何社会现象都是极其复杂的，佛教这个上层建筑更是如此。优点和缺点有时纠缠在一起，很难立即做出定性分析。我们一定要摒除一切先入之见，细致地、客观地、平心静气地对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进行分析，然后再做出结论。只有这样的结论才真有说服力，因为它符合客观事实。

现在大家都承认，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

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公元前传入中国以后，经历了试探、适应、发展、改变、渗透、融合许许多多阶段，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一部分。至于在中国发展起来的禅宗，最终发展到呵佛骂祖的程度，几乎成为佛教的对立面，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深入研究的。佛教在中国产生了许多宗派，有的流布时间长，有的短。几乎要跟佛教“对着干”的禅宗流传的时间反而最长，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我还想在这里谈一谈整个宗教发展的问题。冯定同志在世时，我有一次同他谈到宗教前途问题。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宗教先消灭呢，还是国家、阶级先消灭？最终我们两人的意见完全一致：国家、阶级先消灭，宗教后消灭。换句话说，即使人类进入大同之域共产主义社会，在一定的时期内，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想法，还会以某种形式存在着。这看起来似乎类似怪论，我却至今深信不疑。我记得，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大意是：宗教是有宗教需要的人们所创造的。“宗教需要”有多种含义：真正的需要、虚幻的需要，甚至麻醉的需要，都属于“需要”的范畴，其性质大相径庭，其为需要则一也。否认这一点，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不要宣传唯物主义、宣传无神论了呢？不，不，决不。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宣传、坚持唯物主义是我们的天职，这一点决不能动摇。我们决不能宣传有神论，为宗教张目。但是，唯其因为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就必须承认客观实际，一个是历史的客观实际，一个是眼前的客观实际。在历史上确实有宗教消灭的现象，消灭的原因异常复杂。总起来看，小的宗教，比如会道门一类，是容易消灭的。成为燎原之势的大宗教则几乎无法消灭。即使消灭，也必然有其他替代品。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佛教原产生于印度和尼泊尔，现在在印度它实际上几乎是不存在了。现在的一些佛教组织是人为地创办起来的。为什么产生这个现象呢？印度史家、思想史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什么伊斯兰的侵入呀，什么印度教的复活呀。但是根据马克思的意见，我们只能说，真正原因在于印度

人民已经不再需要它，他们已经有了代用品。佛教在印度的消逝决不是由于什么人、什么组织大力宣传、打击的结果。在人类历史上，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消灭宗教，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十分罕见。

再看一看眼前的客观实际。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国至今已有七十年了。对无神论的宣传可谓不遗余力，对宗教的批评也可谓雷厉风行。然而结果怎样呢？我们现在从许多刊物上都可以读到，在苏联，宗教并没有被消灭，而且还有一些抬头之势。“一边倒”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决不认为苏联什么都好，但是苏联的经验和教训，确实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总之，我认为，对任何宗教，佛教当然也包括在内，我们一方面不能去提倡；另一方面，我们也用不着故意去“消灭”。唯一的原因就是，这样做，毫无用处。如果有什么地方宗教势力抬头的，我们一不张皇失措，二不忧心忡忡。张皇无用，忧心白搭。宗教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产生出来的，它也会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时消灭。操之过急，徒费气力。我们的职责是对人民进行唯物主义、无神论教育。至于宗教是否因之而逐渐消灭，我们可以不必过分地去考虑。

宗教会不会成为社会发展、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呢？会的，但并非决定性的。研究宗教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宗教会适应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而随时改造自己，改变自己。在欧洲，路德的宗教改革是一个例证。在亚洲，佛教小乘改为大乘，大小二乘在个别国家，比如说在日本，改为和尚能结婚，能成家立业，也是一个例证。在日本，佛教不可谓不流行，但是生产力也不可谓不发展，其间的矛盾并不太突出。我刚从日本回来，在日本，佛教寺院和所谓神社，到处可见，只在京都一处，就有一千七百多所。中国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同日本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我参观的几所寺庙占地都非常大。寺里绿树参天，净无纤尘，景色奇秀，幽静宜人，同外面的花花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人一走进去，恍如进入另一世界。日本人口众多，土地面积狭小，竟然留出这样多的土地供寺院使用，其中必有缘故吧。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非常有意义的现象，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佛教在日本，不